

最低工资标准:寻求多方共赢

如何认识纠结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上的争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由于劳动力不是一种普通商品,劳动力价格并不是纯粹由市场决定的,除了市场竞争,还会有政府从法律制度上的调节,还有劳资双方的谈判和利益博弈。

春节过后,各地劳动力市场的动态成媒体关注热点。“珠江三角洲地区用工缺口达200万人”的数字,让该地区持续了一段时间的“用工荒”现象难见缓解迹象。看得出来,打工者在外打工的成本与收益之间算账,用工者也在用工成本与收益之间打着算盘,二者的博弈呈胶着、僵持状态。

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回暖,继江苏年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之后,北京、重庆、上海、深圳等地也拟调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尽管不少打工者并不太在意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与自己拿到手的薪水之间有多大联系,或者说,二者之间也不会产生明显的直接联动,但最低工资标准的托底作用是实实在在的。

正如支持这一制度的人士所认为,推行最低工资标准,体现了基本的经济伦理,能让低层

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有一个兜底的保障,能让他们在看着别人挣大钱的同时,自己的日子也过得去,这无疑有利于增进社会的和谐。从经济层面而言,劳动者口袋里有钱了,才有能力消费,才会促进消费市场的扩大,推动国家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而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带来了一场消费革命,就是一个例子。还有,推行最低工资标准,能促使企业加快产业升级,不再停留于靠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赚取可怜的加工费的来料加工经营方式。

而另一派则认为,最低工资标准涉嫌干涉市

场自由,会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很多生存艰难的中小企业可能会倒闭,打工者就会失业,是“保多数人的岗位”重要还是“保部分人的工资”重要?还有,从工资的提高到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一个过渡期,在劳动密集型产业升级为高新技术产业的过程中,有可能使得一些企业被淘汰,流失一部分投资,这就会牺牲短期的经济发展空间。

如何认识纠结于最低工资标准制度上的争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力供求关系是决定劳动力价格的重要因素,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同时,由于劳动力不是一种普通商品,人们期

待类似的政策支持能给中小企业松绑,使它们可以有更多的发展空间,即使想压缩成本,也有能力从管理、科技创新方面着手,而不只盯着打工者工资这一块成本。这样,“保多数人的岗位”还是“保部分人的工资”或许不再是二选一的难题。

其二,如果能够强化劳动者的谈判和博弈能力,则最低工资制度推行起来会更为顺畅。比如,大力推进集体合同的签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等。

最低工资标准制度的核心,即公平与效率间的平衡,把握好这一平衡,让最低工资标准这把“双刃剑”不误伤任何一方,确实不易。正如我国薪酬专家日前所说,现阶段普遍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具备一定客观条件,但如何把握好时机和力度至关重要。

有了“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只是第一步

□张贵峰

国家质检总局和国家标准委日前联合发布的我国首部专门强制性国家标准《专用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将于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据报道,依据该标准,小学生校车必须每座配备安全带,须安装“汽车黑匣子”,双层客车和铰接客车均不得作为校车,校车至少应设两个应急出口等。

小学生校车安全技术条件有了强制性的国标,体现了政府对于未成年人交通安全问题的重视,也意味着孩子们的出行安全将更有保障。不过,上述校车国家标准和安全技术条件仍是一个初步的东西,还有不少有待完善之处。

比如,该标准的适用范围涉及的是小学生校车,交通安全问题同样突出的幼儿园校车,以及同属义务教育范畴的初中校车,都未被纳入其中。

再如,与一些校车安全保护先进的国家相比,上述安全技术条件所规定的内

容仍显单薄。以美国为例,多达数十项的安全标准几乎涵盖校车的所有零部件。设置了远远超出一般车辆的严苛安全技术标准。与此同时,还赋予了校车道路通行特权——如校车在停车、上下人之时,将自动显示专门的交通信号,周围其它车辆必须减速或停驶。

在安全技术条件标准之外,还有许多

配套制度必须及时跟进,比如,校车的安全技术标准提高了,制造、购买、使用运行的成本无疑也将大大增加,那么谁为这一增

加的成本埋单、如何埋单,便是一个现实问

题。再如,确保校车合理使用、有效运行的

管理制度,包括司机、随车照管人员的培训

管理,校车运行的特殊交通管理等。

新闻观察

□练洪洋

要年轻化,不要“伪年轻化”

怎么可能直升法院副院长?这不但与《法官法》相关规定不符,也有违常规。同样,一位23岁的姑娘,大学毕业才一两年,凭何德何能当上副局长?

“干部年轻化”是一件好事。比如在当年的特定时期,干部年轻化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保证了干部队伍的稳定与活力。到了今天,干部任用往往有年

就怕某些“伪年轻化”。

“伪年轻化”的表现在于,年龄成为干部选拔最重要的条件,唯年轻是举,德、能、勤、绩、廉等都不再重要;年纪越轻就越有优势,年轻化逐渐演变为“低龄化”。“伪年轻化”现象一旦泛滥,不但使真正有才有识、经验丰富的干部因年龄问题得不到提拔重用,浪费了行政资源,而且让一些“鱼目”因此顺利地混入“珍珠”中——某些人可以利用“干部年轻化”这个幌子,轻而易举、名正言顺地

将自己年轻的子女、亲戚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为他们的飞黄腾达铺路。

要判断23岁当上副局长是年轻化还是“伪年轻化”,其实很简单,那就是将其能力、政绩拿出来晒晒,让公众看看他们是否德配位否,提拔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更进一步,将其家庭背景也曝曝光,看其背后是否有只无能的手在做文章。而仅仅公示几个考评分数,是不足以让人信服的,招来质疑和猜测也是难免的事。

图说

□赵春青/画



禁酒令

据《济南日报》报道,今年,山东省济南市将进一步规范和改革公务接待,在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实行工作日中午禁酒,严禁用公款大吃大喝。

类似的禁酒令发过不少,但遗憾的是,红着脸上班的公务员仍然为数不少。有人之所以不看好这些禁酒令,甚至认为是中看不中用的“稻草人”,问题就在于,没有相应的辅助措施,缺乏“由谁监管”、“怎样执行”以及“不遵守会受什么惩罚”的基本罚则。

今年,河南郑州将把握水价调整结构的力度和时机,积极推行居民生活用水阶梯式水价制度——据2月21日《工人日报》报道,此消息再度引起郑州市民和社会各界的关注,他们在肯定阶梯水价有助于培养居民节水意识的同时,担忧水额度划分出现的偏差可能会造成新的不公平,更担忧阶梯水价演变变成相涨价。

从经济学角度讲,梯形水价是最理想也是最恰当的水价制度,因为梯形水价既有利于节省普通市民的水价开支,更有利于政府部门通过水价来控制水资源浪费。郑州推行梯形水价受到市民的质疑,笔者以为有两方面原因。

□徐光木

心理阴影与现实担忧

其一,人们担心梯形水价会受到其它公共产品价格制度的牵连。众所周知,一些定价机制之所以常被百姓理解成涨价机制,不是因为类似机制不科学,而是这种机制在实际运行过程中被不恰当地利用,跟涨不跟跌,跟涨快、跟跌慢。梯形水价也是如此,在缺乏公开透明的定价机制之前,谁又能保证梯形水价不被人利用呢?

其二,成本透明是梯形水价的最大前提。一直以来,人们反对包括自来水在内的公共产品涨价,主要原因是公共企业或部门不乐意公布公共产品的必要成本,连自来水的管

道铺设、消毒、运输、日常维护成本都不清楚,百姓又怎么会相信“企业亏损”的理由,并拥护相关的改革呢?

可以说,是以往某些做法留给公众的心理阴影,导致了人们今天对梯形水价改革的担忧。

因此,我们不应该将市民担心梯形水价是变相涨价当成改革的阻力,而应该将这种担心转化成推进企业成本改革的动力。只有让百姓能够从梯形水价改革中受益,人们才会把梯形水价理解成服务民生的好措施。这里是水价企业或部门应该考虑的重中之重。

真的吗?

王然:可笑!我还没有男朋友呢。我的父母都是农民,我2003年考入山东工商学院,主修人力资源管理,辅修金融学。2007年我就考上了公务员,至今工作3年,而网上有些人猜测我2008年考上的公务员,是错误的。

记者:王然,有网友质疑两次面试都

笔试成绩高,你能否解释是怎么回事?

王然:在参加这次考试前,我一直在准备国家公务员考试,所以准备得比较充分,我的笔试和面试都是第一名。面试成绩比笔试高,不只我一个人,考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入围的10人,面试成绩都比笔试高,因为这是两次不同考试,面试考官和笔试评委者都不是一批人。

破格提拔能否担当重任?

记者:一些网民认为,一般副局长应该从科长中提拔,从副科长到副局长已经是越级提拔了。这些年轻人很多连副科长也不是,今后能否承担起岗位重担?

王然:这次选拔是优中选优,年轻的干部能脱颖而出是胜在专业知识较强方面,新泰市选拔年轻副局长干部也是为了今后储备人才。事实上,除了这6名“80后”外,还有不少这个年龄段的人参加选拔,如在报考国有资产管理局副局长入围面试的10人中,有8人属于“80后”,即便王然落选,也很可能是另外一名“80后”入围。

记者:王然、刘婷婷,作为新上任的领导干部,你们对今后发展有什么考虑?

王然:从大学到工作岗位时间不够长,确实对担任领导干部有影响,3年的工作经历也許不算上什么,但我会努力去做。没有理由认为年轻人就不能走上领导岗位。同时,我将向单位的老同志多学习、请教。

刘婷婷:我已开始在新岗位上工作,目前仍在交接阶段。我没想到自己能考上,也未想过干部年轻化已进步到这个程度。干部年轻化为“80后”提供了一个锻炼成长的平台,我很珍惜这个机会,决不辜负党和人民对我们的期望。我觉得不应该用年龄段来划分个人能力,我深知自己责任重大,相信通过以后的努力和先前的积淀,是可以胜任的。

记者:新泰市对于这些新提拔年轻干部的培养是如何考虑的?

丁湖强:这次对年轻干部的选拔力度很大,新泰市将加强对他们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培养和锻炼,使他们尽快适应新岗位的要求。今后我们还打算继续选拔优秀的年轻干部,充实到队伍中去。

(新华社济南2月22日电)

“一样的土地,不一样的生活”

——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镇统筹城乡发展的实践

本报记者 姜明

在京津塘高速公路天津机场出口旁,有一座现代化新城在初春展现着生机与活力,这就是天津市东丽区华明示范小城镇,这里居住着华明镇原12个村庄的4万多人。

走进华明示范镇,展现在记者眼前的是

一幅秀美画卷:错落有致的楼房,纵横交错的宽阔大道,富有文化气息的公园、广场……

华明镇的巨大变化,是天津市新农村社会生

活发展的缩影。近年来,天津创新农村城市化

模式,在东丽区华明镇探索以“宅基地换房”

建设示范小城镇为龙头,推进农村居住社区、

工业园区、农业产业园区“三区”统筹联动发

展,打造拥有薪金、租金、股金、保障金的“四

金”农民,有效破解了农村城市化进程中的土

地、资金和出路三大难题,走出一条加快大城

市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的新路子。

华明镇紧邻滨海新区,距天津市中心区

13公里,规划建设农民安置住宅和配套公建142.5万平方米,涉及12个村、1.3万户、4.5万人。华明镇通过宅基地换房,使农民的家庭财产大幅增加;原来农民居住土坯房或砖混房,估价在2万到5万元。到新的小城镇置换一套80多平方米住宅,价值超过了40万元,农民的住房资产增加了10倍左右。东丽区委、区政府还将土地增值收益用于返还农民的社会保障,返还农民达到规定的年龄,就可以享受每年400元到500元不等的社会保障金。

目前,华明镇的教育、卫生、文化、体育设

施完善,水、电、气和集中供热等基础设施齐

全,农民的生活品质得到大大提高。

据了解,华明街12个村原有宅基地12071

亩,新建小城镇农民住宅区占地3476亩,宅基地全部复耕后扣除小城镇中农民住宅区以及商

务区、产业园区、市场出让土地后,仍节余3600

亩,而预留经营开发用地的出让收益,完全可

以平衡农民迁至住宅和公共设施建设所需40亿元资金,有效解决了土地和资金难题。

华明镇党委副书记张长河告诉记者,在推进“宅基地换房”的过程中,一切体现以人为本,把农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在国家现行的政

策法律框架内,坚持承包责任制不变,可耕种

土地不减,尊重农民意愿的原则,农民用自己

的宅基地。

华明镇工程就是咱农民的幸福工程!

现在,村里人就跟城里人一样,进工厂上班拿工资,

还有社保医保。以前,村民养老得找儿女要钱,

现在老人们每月都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

真正实现了“让村民搬得起,让村民住得好,让农民有保障,让农民能乐业”。

谈起自己的幸福生活,薄金生感叹说:

“华明镇工程就是咱农民的幸福工程!”现在,

村里人就跟城里人一样,进工厂上班拿工资,

还有社保医保。以前,村民养老得找儿女要钱,

现在老人们每月都能从政府领到养老金。

经众多海内外专家评审,华明示范镇在

全世界87个城市106个参赛项目中,成功入选

2010年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有关人

士认为,“华明模式”是我国农村城市化进

程中的成功创新实践,探索出一条加快大城

市近郊农村城市化进程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

设的新路子,具有较强的典型性和可推广性。

36个生产型项目入驻,总投资额达100亿元,

利用已完成复垦的土地建成了现代化的农

业示范园区,保证有就业能力和需求的农民基

本部全部就业。

73岁的薄金生是土生土长的华明镇人,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赤土村。“原来,我家是一

间40多平方米土砖房,夏天潮湿闷热、冬天冷风飕飕,现在,我和老伴住上了两室一厅97

平方米的大房子,夏天用空调、冬天有暖气,再也不用受热挨冻了。”薄大爷笑得合不拢嘴,“我虽然还是农业户口,但居住环境、社会福利比有些城市还要好,生活就像花儿一

样美丽。”

谈起自己的幸福生活,薄金生感叹说: